

【历史研究】

古代上海地区发生的中日佛教交流

——以宋元为中心的考察

张晓东

(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上海 200234)

[摘要] 古代上海地区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上海地区在古代曾是中国和日本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而宋元时期表现突出。期间有两件大事值得研究,一是宋代日本名僧俊苾来华学习佛学,回日本京都传播佛法。二是名僧清拙正澄先来上海驻锡传法,后应日本上层邀请东渡传法,影响深远。这不仅是古代上海地区参与中日佛教交流并起到地理上重要桥梁的历史见证,也反映宋元时期上海地区的佛教发展状态。宋元时期中日佛教宗派发展的阶段性存在一定时间落差,这加强了不同时期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学习的需要和可能。上海地区地处东南沿海,是经济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面向海上的对外交流门户,本地经济、交通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吸引名僧进驻,保存大量经典,且能借江南与海上丝绸之路两端左右逢源获得机遇。

[关键词] 上海;佛教;丝绸之路;中日交流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3-0050-07

上海地区^①在古代曾是中国和日本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以宋元时期表现突出。期间有两件大事值得研究,一是因五代时期吴越国和新罗、日本的佛教典籍文化交流颇有成果,日本名僧俊苾来华学习佛学,回日本京都传播佛法。二是名僧清拙正澄先来上海驻锡传法,座下多有来华日本僧人交流,后应日本上层邀请,东渡传法,影响深远。这不仅是古代上海地区参与中日佛教交流并起到地理上重要桥梁的历史见证,也反映宋元时期上海地区的佛教发展状态。此一问题至今未见有相关研究。

一、宋代的上海地区与

中日佛教交流:俊苾国师来华

上海地区古代佛教历史悠久。《高僧传》讲月支优婆塞支谦汉末避难吴地(今苏州一带),曾被孙权“拜为博士”,^[1]地方志记载相传在三国时期就出现的上海地区寺庙有菩提教寺、赤乌庵和帝敕庵。龙华寺及塔也相传建于三国东吴赤乌年间,是移居

交趾的天竺康居人名僧康僧会所立基。对于静安寺的起源,观点不同。宋绍熙《云间志》记载赤乌十年康僧会入境,静安寺本名沪渎重玄寺,是东吴孙权于赤乌年间所建。南朝梁代出现松江中石佛浮江的异事,乃有开元寺之建。^{[2]1-3}宗教故事难以证实具体事实,但是海上丝绸之路是早期佛教进入江南地区的重要途径毫无疑问,这也是反映包括上海的江南地区佛教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结下的不解之缘。

唐宋时期伴随航海进步,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有大的进步。南宋中期,庆元五年(1199),日本高僧不可弃俊苾率安秀、长贺等僧人搭乘日本商船来华。俊苾来华本为解决戒规疑问,不仅学天台宗,也学密教:“先传瑜伽密教”,^{[3]382}后来研究大小戒律,来后留学十二年,所学很多,不仅先向了宏学习南山律,更是进一步再学密、禅和天台三宗学问。^{[4]138}自1199年四月俊苾入宋境,先是游历了两浙路江南名寺,曾在宁波雪窦山学禅,再

[收稿日期] 2018-12-15

[基金项目] 本文是2018年度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内招标课题项目“历史时期的上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与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最终成果。

[作者简介] 张晓东(1977—),男,山东威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运河史和中国海洋史。

到到四明景福寺向了宏学习律学,又到古代上海地区的华亭县超果教寺学习天台宗教义,拜在名僧北峰宗印门下八年之久,“执经受教,尽通其旨”。^{[3]382}还曾到温州向广德律师学“七灭诤”。开禧年间,南宋与金朝开战,俊芿法师禀告北峰,说自己要模仿唐代“开元三大士”之一的密僧不空法师“结坛诵咒”,以助得胜,“时论委靡,竟不克行”。^{[3]367}俊芿不能成功,于是“北峰乃令遣徒归国,取中华先所传五部之法,而其徒沦于海”。^{[3]382}唐代密宗盛行一时,传入日本,形成日本特色宗派,后世所能见到的唐密形迹只好在日本密宗发见。北峰令俊芿派徒弟回国取日本保存的密法,一旦成功,不仅使做法祈祷可以进展,也可以使中日佛教因密宗交流而取得成绩,但是可惜因为海难不能成功。

公元1211年俊芿回国,带回不少佛学典籍,还包括舍利子与佛教题材绘画,甚至儒家经典,^{[5]359}包括律宗经书327卷,天台宗章疏716卷,华严宗章疏175卷,儒书256卷,杂书463卷,以及碑帖拓印,共2103卷。这批文献以卷数而论以天台宗经典最多。返回日本之后,日本禅宗大师荣西法师将他延请入京。这位高僧先后得到数位天皇,包括上皇的皈依受教,在京都创建泉涌寺,传播带回的佛法。他带回的经典包括《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目录》中所见《台宗十类因革论》四册、《四明十义书科》一册、《四明十义书》二册、《山家义苑》一册、《圆悟录》二册、《佛祖宗派总图》一帖等六种宝贵书籍和很多天台典籍,至今仍藏在东福寺,并曾在1918年第四次大藏会上展出。^{[5]353}其历史功绩之一即为促成日本天台和律宗中兴,回国后形成“北京律”学派。仅仅关注其佛教文化交流贡献是不够的,因为他也对儒学和书画艺术的交流做出了贡献。《泉涌寺不可弃法师传》称其“盛唱《四书》,兼讲诸部”。俊芿圆寂后,被迫谥“大兴正法国师”,到明治十六年俊芿竟然还被追封“月轮大师”。

南宋时期的日僧俊芿为何选择在华亭超果教寺学法?原因有三,试分析之。

第一,中日佛教发展大势的阶段性的决定宋代天台宗成为日本佛教向中国佛教学习的重点,而此时江南地区成为佛教文化重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开始了重要发展阶段,而佛教也自中国传入日本。唐代佛教昌盛,宗派衍生,也影响了邻国佛教佛学。中国佛教首个宗派天台宗对日本文化影响之大以致被称作“日本文

化之母”。最初是最澄和空海同时入唐求法,把天台宗传入日本,天台宗在日本朝廷的支持下逐渐风行社会。天台宗和真言宗曾是日本平安时代最盛行的佛教宗派,曾出现入唐求法的高潮,同时求法者多受密教影响,因此与中国不同,加上了很多密宗和禅宗的东西。^{[4]54}

但是,当日本天台宗初步兴起的同时,中国天台宗却将面临一轮衰落。晚唐与五代的一武一宗灭佛,即唐武宗和周世宗对佛教的限制和打击,使唐代兴盛起来的各佛教宗派保持顺利传承遇到一定困难,唐末和五代十国的战火更是雪上加霜。随着唐朝的衰落和走向战乱,自唐末到宋初,中国天台宗实际是先衰落后振兴。因天台宗有重视理论经典的传统,佛学传承比其他宗派更需要依靠经书流传。《佛祖统纪》称:

“传圣人之道者,其要在乎明教观而已。

上尊龙树下逮荆溪(湛然),九世而祖之宜矣。至于邃、修二师,相继讲演不坠素业。会昌之厄教卷散亡,外、琇、竦三师唯传止观之道。”^{[3]201}

五代时北方战乱不休,经济重心加快南移,而周世宗在北方推行灭佛,使得佛教重心也逐渐南移。江浙佛教宗派兴盛者以禅宗和天台宗为最强,存在相互学习和交融的现象,但是禅宗也有压倒天台宗的趋势。两宗如藤萝共生,不仅名僧倍出,且多有通识高僧。十国中的吴越国王推行保境安民政策,且尊崇佛教,使其境内佛教有所兴复。吴越国王尊崇的高僧多是天台宗僧。忠懿王钱弘俶信仰本地发源的天台宗,读《永嘉集》有一疑问问名僧德韶,德韶说是天台教义,称需问天台高僧羲寂,于是羲寂开始被重视。羲寂说:“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3]204-205}“于是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3]262}“至是,高丽遣沙门谛观持论疏诸文至螺溪谒(义)寂法师,一宗教文,复还中国。螺溪以授宝云,云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讲说,遂专中兴教观之名。”^{[3]1018}谛观曾作《四教仪》,为天台佛学名著。同时天台宗第16祖高丽人宝云义通受具后学《华严》《起信》,入义寂门下,在浙东弘扬教法20年。国王还多次遣使往日本求天台典籍。《杨文公谈苑》称:“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买书于其国主,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讫,今天台教大布江左。”^[6]

① 本文所用上海地区一词指今天上海市行政管辖范围在古代的对应的地理范围。

天台宗在知礼、遵式等名僧的努力下,在北宋前期实现中兴:

“螺溪网罗教典,去珠复还;宝云二纪敷扬,家业有付。两世方尊法智(知礼)为中兴者,以其有著书立言,开明祖道,抵排山外,绍隆道统之功也(抵音抵,触也)。故慈云(遵式)赞之曰:章安既往,荆溪亦亡。诞此人师,绍彼耿光。一家大教,钟此三良。”^{[3]207-208}

《佛祖统纪校注》卷12《四明法智法师法嗣》称知礼一生“嗣法二十七人,入室四百七十八人,升堂一千人。”

日本情况则相反,自唐晚期开始,便不断有日僧慕名来学天台宗,但在宋代进入低谷期,典籍缺失,迫切需要新的动力。镰仓时代以后的天台宗出现内乱,^{[4]130-131}甚至武斗开战。^{[4]132}北宋来华日僧多是来学天台。甚至有葬于天台山者,如成寻法师,^[7]中兴的天台法脉在宋代继续吸引日本和高丽的僧人。

第二,天台宗中兴是自五代江浙地域开始的,宋代上海地区也是江南地区佛教天台宗中心之一,此地佛学昌盛,名僧辈出,经典保留丰富天台宗尤甚,超果寺台教佛学极盛,这是吸引日僧的环境条件之一。

中古时期佛教已在江南广为流传,佛寺普遍兴建,宋代上海地区尤甚。有学者统计在唐代上海地区兴建寺庙16座,^{[8]73}五代建立6座,^{[8]75}而北宋上海地区至少兴修寺庙18座,^{[8]84}南宋上海地区兴建86座,另外还有不能分辨是南北宋那一朝修筑的10座以上。^{[8]105-106}唐宋上海地区对外港口青龙镇的佛寺很有名气,镇内建有3亭、7塔、13寺院,居民“事佛尤谨。方其行者蹈风涛万里之虞,怵生死一时之命,居者岁时祈禳吉凶荐卫,非佛无以自恃”。“浙右喜奉佛,而华亭为甚,一邑之间,为佛祠凡四十六,缁徒又能张大其事,亦可谓盛矣。”^{[9]25}超果寺或正因上文所述吴越王取经行动而成为天台宗重地,直到宋代又吸引日本僧人来求法。

唐宋上海地区出过不少高僧。唐华亭人心镜禅师藏夙本主持洛阳长寿寺,回乡后于咸通十五年创一长寿寺,为超果寺前身^{[9]26}:

“会昌废寺,大中复修洛下长寿寺,敕奂居焉。奂后尝归乡造寺,岂此复名长寿寺乎?……(宋)治平元年,改今额(超果)。”^{[9]26}

公元11世纪北宋“法师会贤,早为(名僧)南屏高弟,初弘教于华亭超果,学者如市。”^{[3]312}会贤门下名僧如彦伦、清辩各有著述。彦伦作《精微集》四

卷,清辩作《顶山记》,释天台戒疏三卷,先后主持钱塘、常熟、苏州、衢州多处寺庙。^{[3]331-332}超果寺还出过道法师和弟子从进,从进曾做《楞严解》。^{[3]365}宋名僧灵照也曾住持华亭超果寺,“每岁开净土会七日,道俗常二万人。”^{[3]598}

被俊苻拜师的名僧北峰宗印(1148—1123),十五岁受戒,师从竹庵可观。可观俗姓戚,华亭县人,曾师从南屏精微,后投名震江浙的择卿门下。可观道业深湛,与相公往来,被皇子魏王请到宁波主持名寺延庆。^[10]宗印对天台佛学领悟很深,曾应邀主持多个寺院,包括超果、圆通、北禅,“禅讲并行,法道益甚”,^{[3]366}作《北峰教义》,得宋宁宗召见,讨问佛学,得赐号慧行法师,^{[3]366}培养不少名僧弟子,死后葬于松江慈云塔。^{[3]367}其弟子法照被重臣史弥远等重视,得宋理宗接见。^[11]南宋时超果寺还出过名僧从进,为道法师法嗣,“为学早成,久依超果,具得其道。”后出主持德藏寺,作《楞严解》。^{[3]365}当地还有法师惠辩本“华亭傅氏”,受业华亭普照寺。^[12]宋代华亭名僧辈出,不一而足。

宋代华亭地方官府也很关心佛教,如青龙镇官府也很关心佛教建设,如北宋秀州华亭县福善院僧人募财铸钟,青龙镇巡检侍禁王继斌莅临主持。^{[2]14}陈林北宋元丰五年作《隆平寺经藏记碑》讲“合众力,植巨轴,贯两轮,纳匱五百,放双林善慧之制,藏所谓五千四十八卷者。”^{[2]22}

天台宗名寺超果寺在南宋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大贡献,与五代吴越国王求经海外及宋初天台宗振兴也不无关系。该寺本身不仅历史悠久,在五代时有灵异事件出现:

“吴越钱王时,尝送观音像至寺,现佛光之异,因名寺井曰‘瑞光井’。”^{[9]349}“(观音像)梦感于王,欲适云间。王命庆依尊者奉像往。主寺者释聪,于像未至前,曰:‘三日内,当有主公至。’至期,果然。像初至,礼塔汇,去寺十里,近髻上有光,贯于寺西井,井有金鳃放光,相接若虹霓然。今名瑞光井者是也。宋理宗书赐额曰‘超果灵感观音教寺’。”^{[9]350}

超果寺在宋初本不兴盛:“先是界相东南,地隙草茂,时和年丰,民有余施。师徒日演,广厦斯作。讲诵未闻,人莫知向。”^{[9]61}而天台法师惟湛云游来此,努力振兴:“于是檀供旁午,规模备具。复即净室作西方弥陀之像,其高十有六尺,岿然垂臂,”乡里人士为之捐献金粉涂饰,于是气象一新。^{[2]20-21}该寺天台渊源深刻,“寺东为天台教院,后并为一。”^{[9]349}两寺合二为一。

第三,宋代上海地区已成为中日之间丝路航运与交流之重镇。交通条件良好促进国际交流。

宋代比前代航运技术进步,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赶超陆上丝绸之路。唐宋时期上海地区的港口发展迅速,在扬州港逐渐衰落的同时,上海地区的华亭县青龙镇港日益兴起成为替代。^{[13]126} 早在大中元年(847)就有人乘船自当地出发远航日本。^{[13]129} 北宋时期则有日本商船前来贸易:“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2]18} 宋代华亭县出现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机构,^{[14]3369} 两浙路市舶司一度设在华亭县。^{[14]3370} 南宋晚期青龙镇衰落,同时却有黄姚镇港、上海镇港、江湾镇港一度构成新兴的港口群,其中上海港长兴不衰直至元代。宋末在上海镇也设立了市舶司。^[15]

宋代上海与日本间海上交通已经成熟。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通过青龙镇的陶瓷中转贸易发达,产地甚至远自长江中游长沙窑,目的地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印度洋周边。^{[16]178} 青龙镇遗址“是目前发现闽江流域窑口产品数量最大、位置最北的港口”,^{[16]202} “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宋代)龙泉窑瓷器”。^{[16]210} 来自浙闽的陶瓷不少是要出口东北亚,销往日本和朝鲜,器型与东北亚出土中国陶瓷形制一致。青龙镇出土宋陶瓷还有来自福建同安窑、福建建窑以及景德镇窑、吉州窑、东张窑、茶洋窑、义窑的,而“在日本博多遗址、韩国马岛沉船及我国东海、南海沉船都发现了大量的义窑产品”。^[17] 同安窑出产的“珠光瓷”畅销日本,建窑黑釉瓷器出口日本量很多,称“天目瓷”。

北宋青龙镇隆平寺古塔曾充作航标作用,形成独特的滨海景观。一方面,作为港口交通景观,它吸引海上航行者的关注,一方面,作为城镇宗教文化景观,它又是当地佛教的标志性建筑,因此在很多海上航者的眼中丝路名港青龙镇和江南佛教胜地联系在一起。事缘当初有僧人和信徒提出“此镇西临大江,与海相接,莽然无辨。近无标准,远何繇知,故大舟迅风,直过海口,百无一二而能入者。因此失势漂入深波石礁,没舟陷人,屡有之矣。”于是集资修塔救难。^{[2]18}

二、元代上海地区与中日佛教交流:

清拙正澄去日

宋元时期中日佛教交流以上海为桥梁发生的

第二段佳话是清拙正澄赴日本。元代日本临济宗祖师,中国名僧清拙禅师(1274—1329),讳正澄,本福建连江人,先后师从参平楚耸、谷源岳、无方了普、大歇真、虎岩净伏、东岩净日、愚极智慧等禅宗高僧,曾在鸡足山修庙弘法,在杭州净慈寺学法十五年,最后投靠在真净寺的亲兄月江,驻锡松江。清拙的佛学修为极精,《即休契了禅师拾遗集》记载称:

“师讳正澄。字清拙。福唐连江邑刘氏子。世业儒。母孙氏梦。僧伽授以神珠。有娠。咸淳甲戌。正月十三日生。白光满室。幼敏不群。至元丙戌。年十三。父母知其志。送依城南之报恩。圆公月溪师。下发。既受具。即参方。造杭之净慈。慧公愚极师之室。语契机。俾执侍。极入寂。宝公方山师补处。改典法藏。职满巡礼。至袁之仰山陵公虚谷师。嘉其造诣。延以第一座。谷迁径山熙公晦机师嗣席。举以鸡足出世。倡极之道。立三关语。透者难之。既谢事。复吴淞。省其同母兄印公月江师于真净。因留以养高。”^①

许多来华日本僧人集于座前,名声因此传到日本。泰定三年(1326)日本当政者北条氏招聘清拙去日本。

据《日本古先原公传》记日本名僧印原为解答佛学困惑来华,随清拙正澄赴日本弘扬佛教,相助之,多有建树:

“徧历诸师户庭,咸无所证入,乃慨然叹曰:‘中夏乃佛法渊藪。盍往求之乎。’于是,绝鲸波之险,奋然南游(中国)。……复见诸大老,皆无异词。会清拙澄公,将入日本建立法幢。师送至四明,澄公曰:‘子能同归,以辅成我乎?’师曰:‘云水之踪,无住无心,何不可之有?’即摄衣升舟。其后澄公能化行于遐迩者,皆师之力也。然瓣香酌法乳,的归之中峰。师化大行,专以流通大法,建立梵宫为事,若丹州之愿胜,津州之保寿,江州之普门,信州之盛典,房州之天宁,皆郁然成大兰若。而建长之西,复创广德庵,命其徒守之。如慧林、等持、真如、万寿、净智,皆师受请弘化之刹,劳绩之见不与焉。年度比丘千余人,非所度而受法称弟子者不与焉。”^②

正澄到日本后深受幕府首领北条高时及后醍

① 《即休契了禅师拾遗集》,《卍新续藏》第71册,东京株式会社国书刊行会,1967年,第104页。

② 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一三,《卍新续藏》第77册,第465页。

醐天皇之敬重,先后住持建长、净智、圆觉、建仁、南禅诸大寺,且应信浓守护小笠原贞宗的邀请,前往开创信浓开善寺。名僧转迁寺院是一种扩大交流面的传统方式,考虑到来异国传法的需要,清拙在多寺间转迁也有助于佛法的传播。当在一个寺庙取得按照中华佛教宗旨规矩建树的初步成果后,即可前下去下一个寺庙再行交流甚至整顿。清拙在日本开创“清拙派”,成为日本禅宗二十四宗派之一。他精通禅宗礼法规矩,推行中国禅门《百丈清规》,厘定《大鉴清规》,肃正规制,使日本禅宗发生变革。小笠原贞宗信仰禅宗,制定小笠原家武士礼法时,曾向清拙请教,结果吸取禅宗清规,形成小笠原派礼法,被后世奉为武士礼法的正宗,对日本各阶层的礼法都有很大影响。在清拙正澄主持建长寺时,后醍醐天皇请他去住持建仁寺,不久又请他主持大寺南禅寺,历应二年圆寂于建仁,^{[4]177}死后获得天皇赠谥号为“大鉴禅师”。

在宋朝和元朝,有二十六位中国禅宗名僧前往日本交流。清拙正澄自上海去日传法获得成功,有两个原因不可不察。这件事的成就也是有几方面原因决定的。试分析之。

首先,中日佛教发展大势的阶段性的在元代又出现新的互补性,禅宗在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呈长足的发展,而日本的禅宗出现颓势,需要吸收新的营养。

《元史·释老传》说:“元兴,崇尚释氏。”《佛祖统纪》卷四八称元世祖忽必烈“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事”。元代皇帝关心佛教,曾发起佛道大辩论,结果使《老子化胡经》被正式证伪。元代皇帝举办的佛事规模都很大,无论汉传和藏传的佛教派系都得到良好环境。元初中日关系不睦,元世祖讨伐日本不成功。元世祖和元成宗知道日本上层多信仰南宋传来的禅宗,为修复中日关系都曾派禅僧加入使团去日本。元世祖的使团未能成行。大德三年(1299)三月,元成宗命“江浙释教总统补陀僧一山赍诏使日本”,诏曰“盖欲成先帝遗意耳”。^①一山禅师(1247—1317)于大德三年(1299)得元成宗赐号“妙慈弘济大师”,并赏赐金襴僧伽梨,与去过日本的西涧子昙禅师一起东渡。当政者北条贞时把他们迎至镰仓,以师礼相待,使其先后住持建长寺、圆觉寺、建长寺、净智寺。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日本后宇多上皇下诏请一山住京都大寺南禅寺。一山在日本传播禅宗,使其中心移至京都。日僧虎关师炼记载,一山抵京时,盛况空前:“京之

士庶,奔波瞻礼,腾沓系途,惟恐其后。公卿大臣,未必悉倾于禅学,逮闻之西来,皆曰大元名衲过于都下,我辈盍一偷眼其德貌乎?花轩玉骢,嘶骞輶驰,尽出于城郊,见者如堵,京洛一时之壮观也。某时怀一香,随众伍而展拜,当时人甚多矣。”^{[5]411}一山去世后,上皇追赠其为“佛光国师”,并亲制像赞,称之:“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18]

日本方面禅宗的发展有曲折的一面。由于日本佛教主要传自中国,因此宗派发展兴衰曲线有时呈一个时代的落差。禅宗大兴于唐代,中国禅宗传入日本较早,至迟在宋代已经有禅僧自华来日,但在日本不算流行,远不及天台宗。日本自身的禅宗产生于12世纪晚期荣西禅师从南宋中国求学归来,^{[4]172}开创临济宗。其再传弟子道元入华学禅,1227年归国创曹洞宗。南宋后期,特别宋理宗以后,不少日僧来华学禅,引起日本禅宗立派的高潮,但是寺庙内的仪轨規制仍属落后。淳祐六年(1246)临济宗僧道隆来到日本,得当政者北条时赖召见,建寺,又曾为上皇说法,对日本临济宗发展影响很大,但其推行的山门仪轨仅在其主持的寺庙能严格执行,对其他日本佛寺和整个宗派而言影响甚微。宋朝禅宗盛行,日本僧众来华受影响很大,这种影响渐渐超过天台宗。宋朝亡国后也有不少禅僧避乱日本。传入日本的禅宗号称“二十四派”,且有不少宋元日本禅僧都是显密双修。12世纪晚期到14世纪前期,日本属于镰仓幕府统治时期。北条氏主掌幕府大权下武士阶层存在不小的内争,而寺庙内部也有不小矛盾。有些佛寺通过占有大地产和武装僧兵形成了势力,竟成为与政治统治阶层的公家、武家并列的“寺家”。寺庙间的斗争也很激烈,以致再度存在武斗。可以说僧人的清修呈现堕落,和禅林缺乏严肃的規制不无关系。虽然元初中日关系没有能够在政治上理顺,但文化往来不可缺少。不仅元帝派僧去日本,北条氏也多次派人来华聘请有道高僧,包括迎请过无学禅师和同船的镜堂觉圆等人,以及清拙正澄,而正澄在日本整顿禅林,树立仪轨的努力正合日本禅宗发展的需要,和正澄协助制定的武士礼法一样符合了北条氏整顿寺庙与武士秩序的需要。

其次,元代福建本地佛教禅宗呈衰落趋势,名僧和著作的地域分布都很局限,可是包括上海的江南地域禅宗兴盛,社会经济条件佳好,古代上海地区在元代是佛教兴盛之地,为一禅宗中心,清拙正

^① 《元史》,卷20,中华书局,1976年版,册2,第426—427页。

澄等有发展潜力的高僧来沪是自然的。个人人际关系是一方面,而地域条件对僧人包括对正澄兄弟的吸引也是重要因素。

江南佛教自唐代开始不断有新的发展。有学者统计唐代前期北方佛教寺庙多于南方,而唐后期南方多于北方。^{[19]87-88}如前期苏州有寺 19,后期苏州有寺 31,^{[19]91}唐代上海地区就主要是受苏州管辖。禅宗支脉曹洞宗在唐代江浙很发达,在五代战乱时期呈衰落趋势,但到宋代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好转也得以重兴。元代上海地区有不少禅寺,比如“松江府南禅寺为在城诸禅冠。”^{[2]68}普照寺本是唐朝干元年间兴建的。“松江普照寺有千僧堂”,经唐宋以后数次毁灭,1303 年重建,“千僧齐唱”,“千口万声”。^{[2]75-76}重要佛教史籍《佛祖历代通载》的作者华亭念常法师即为元代华亭县人,至元壬午出生,曾入京缮经,与公卿大臣往来,为之作传序的还有松江佘山招庆寺住持岸岸。^[20]据学者统计元代上海地区兴修的大小寺庙有 107 座,^{[8]117-119}超过南宋和北宋的总和。

再次,上海地区成为中日交流枢纽,故此清拙正澄之盛名易为日人了解邀请。

元代江南地区对外交流的开放港口主要有二,上海与宁波。两地都是江南周边中日之间东北亚丝绸之路枢纽港口,且相邻较近,无论僧人交往、信息流通还是海陆旅行都存在密切联系。元朝初在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澈浦、杭州、温州、广州七个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①后又在雷州半岛设立。八大港位置分布都在南方,其中最北边的一个是上海,其南即宁波,应该是由上海和宁波两处港口充当和日本交通的主要港口。从宋到元上海保持快速发展。元至元十四年,华亭县升为松江府,“二十七年,以户口繁多,更置上海县。”^[21]元代江南土豪多“私造大船出海”,交通日本、琉球、满刺、交趾各地,“外来贸易悉由上海出入,地方赖以富饶。”^[22]上海地区海商崇明人朱清和嘉定人张瑄奉命筹办海上漕运,同时组织私人的海外贸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当时自上海港出发的贸易范围远至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元朝曾禁止对日金银和铜钱的越海互市,^②但是后来仍破例允许日商用黄金兑换日本急需的铜钱。^③元代上海港出口的商品包括有从闽浙地区转运往日本、高丽贸易的陶瓷和金银。进口商品则有珠宝、犀象、香料、药材等蕃货。

经由上海的元代中日交通发达。

三、结 语

本文从中日古代佛教交流中以古代上海为桥梁的两段佳话为基础出发,研讨上海地区在古代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提出如下认识。

其一,上海地区地处东南沿海,是经济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面向海上的对外交流门户,本地交通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且能借江南与海丝两端左右逢源获得机遇,中国江南佛教宗派在宋元时期出现的重要发展与东北亚各国在唐宋元时期开展的丰富佛教文化交流得以借地开展,证明古代上海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不解之缘。

其二,上海地区在宋元时期为江南佛教中心之一,当地良好的经济与交通条件,吸引名僧进驻,保存大量经典,便于中外交流。

其三,宋元时期中日佛教宗派发展的阶段性存在一定时间落差,这加强了不同时期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学习的需要和可能,宋元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特别是南方,大势较好,也不断有成果可以输出。

[参 考 文 献]

- [1] 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15.
- [2] 柴志光,潘明权.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3] 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4] 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5]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6] 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264.
- [7] 顾吉辰.宋代佛教史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143.
- [8] 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9]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册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10] 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卷 30[M].北京:中华书局,

① 《元史》卷 17,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72 页。

② 《元史》卷 14,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285 页。

③ 《元史》卷 208,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4628 页。

- 1994年版,第83册,第113页.
- [11] 闫孟祥.宋代佛教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26.
- [12] 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卷28[M].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2册,第77页.
- [13] 张晓东.历史时期上海地区的地理特征与丝路地位[M]//海洋文明研究:第3辑.中西书局,2018:126.
- [14] 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15]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册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
- [16] 上海博物馆编.千年古港:上海青龙镇遗址考古精粹[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
- [17] 王辉.青龙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63.
- [18] 释东初.宋僧东渡与日本武士道精神[M]//张曼涛主编.中日佛教关系研究.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254.
- [19] 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 [20] 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卷1[M]//中华大藏经:第82册,第8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 [21]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青浦县卷》册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434.
- [22] 崇祯松江府志:卷一[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闫卫平)

Sino-Japanese Buddhist exchanges in ancient Shanghai

——Investigation Centering o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ZHANG Xiao-dong

(Institute of Histor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Ancient Shanghai has a long history of participating i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Shanghai area was an important hub of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ancient times, especially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are two major events worth studying. First, a famous Japanese monk named Junreng came to China to study Buddhism in Song Dynasty and then returned to Kyoto to spread it. Second, a monk named Qingzhuo Zhengcheng came to Shanghai to teach the dharma and then he was invited by the upper class in Japan to teach the dharma there, which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ese is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witness for ancient Shanghai to participate in Sino-Japanese Buddhist exchange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eography,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Buddhism in Shanghai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re was a certain time ga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Buddhism and Chinese Buddhism, which strengthened the need and possibility for Japan to learn Chinese Buddhism in different periods.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 coast, Shanghai is the seaport of the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developed Jiangna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region. With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local economic, transporta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Shanghai attracted famous monks to come and preserved a large number of classics. In addition, Shanghai could take both advantage from Jiangnan region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o find opportunities.

Key words: Shanghai; Buddhist; Maritime Silk Road;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